

流行中國大陸的水滸傳說

馬幼垣

Dep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
Literatures, University of Hawaii

自北宋宣和元年宋江三十六人橫行齊魏，這細節失考的史實，至水滸傳的成書，短者二百五十年（從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撰著說），長則最少三百三十餘年¹。現存作品，確屬這段漫長準備時期的，恐不過九本存真程度參差不齊的雜劇和宣和遺事的一部分²。早期資料的失佚並不妨礙我們相信水滸的成書起碼在若干程度下是基於對零散的水滸傳說的融會和整理。這也不妨礙我們相信，要求在成書程序中用過或未用過的傳說，經過六百多年無文字承傳的真空狀態，又因與水滸內容矛盾疊出，缺乏傳播之所賴，時至今日仍在民間口語相傳，半浮半沉地等待發掘，且一經發掘，復能像雨後春筍一樣，湧湧而出，多至讀不勝讀，可能性該是微乎其微的。

自水滸之流行暢銷，至五四運動以後成為古典小說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水滸的加工文學基本上做的是延續時間的工夫，很少肆意改動大聚義以前的情節，各種續書均如此³，主要的戲劇也如此⁴，二、三十年代在幾次

1 止於招安的水滸原書約成書於明弘治、正德兩朝，說見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央研究院主辦的「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上宣讀的拙文「從招安部分看水滸傳的成書過程」。

2 見注1所引拙文。

3 按撰寫時間，水滸續書可分為三類：（一）五四運動以前的傳統續書，如陳忱（1614—1666以後）水滸後傳、青蓮室主人後水滸傳、俞萬春（1794—1824）蕩寇志；（二）五四至文革以前的續作，如程善之（程慶餘，？—1942）殘水滸（鎮江：新江蘇日報館，1933年）、張恨水（張心遠，1895—1967）水滸新傳（重慶：建中出版社，1943年）；（三）文革以後的新作，如王文中以水滸別傳為總名的五部連鎖作品（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87年）。無論那一類，也不管立場和手法如何不尋常，肆意更動大聚義以前情節，見聞所及，是從未有過之事

大規模網羅民間文學作品中所得的少許水滸故事亦復如此⁵。

由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期，政治因素使水滸在中國大陸享有天之驕子的地位。在這只許讚不容彈的環境裏，與上述情形不同的水滸傳說還是鮮有所聞⁶。

傳說之爲物，對所講的人和事，不一定是褒揚的，也可以採取攻擊態度的⁷。七十年代末期，當批孔評林弄得天昏地暗之際，水滸慘遭歷時一年多的蹂躪，宋江、柴進等首腦人物更是受盡唾罵⁸。大可以用來證明宋江輩始終爲「人民」所不齒的傳說却未曾出現。

這些背景都足以否定大量與水滸內容不相符的傳說在民間廣泛流傳却歷久未上紀錄的可能性。

毛澤東一死，四人幫迅即落臺，鞭撻水滸者既去，喝采之聲隨着復出。這次對水滸的再度好評，不同以前的盲吹瞎捧其爲農民起義教科書那樣單調狹窄（雖然仍主張它講的是農民起義），唯我獨尊，討論範圍得到擴展，立場態度也出現較大的伸縮性，處理方式尤見突破，堪稱多采多姿。在這情形之下，八十年代初期水滸傳說之爭相出籠，本不屬意外事。作爲茶餘飯後助談之資，這些傳說不管與水滸分家至何程度，無傷大雅，是不必追究來源的。問題在它們以出土文物，貨真價實的姿態出現，還往往明示其淵源不晚於水滸本身，甚至還更歷史悠久。既有此聲稱，自然不能等閒視之。

- 4 水滸流行以後的水滸戲是怎樣一回事，可查檢陶君起京劇劇目初探（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3年增訂本）、陝西省藝術研究所編秦腔劇目初考（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帶本事提要的目錄。
- 5 廣州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在顧頡剛等主持下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二年所出版的民間文藝週刊和民俗雙月刊爲昔日這類刊物當中採集範圍最廣和歷史最長者，其中也沒有收入多少與水滸和施耐庵有關的傳說。
- 6 在民間文學、民間文學集刊等五六十年代大陸刊行的有關期刊內就不易找到施耐庵或水滸傳說的影子。
- 7 關於秦檜、李蓮英等人的傳說即可爲例。
- 8 自一九七五年八月至其逝世，毛澤東因政治所需，督策整個大陸毒咒水滸以及宋江等梁山領導人物。這場在他死後仍維持一段日子的活劇製造出數目難以計算，內容卻貧乏得只有三幾個話題的文章。如要找這些代表現代中國悲鳴的「傑作」來看看，可檢閱開展對水滸的評論（香港：三聯書店，1975年），和北京大學中文系聞衆反面教材水滸（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這些傳說分爲講梁山人物與講施耐庵兩大類，涇渭分明，交流點少到可說不存在。傳播的地域，負責整理的人士，亦同樣儼分畛域。梁山人物故事差不多是山東（特別是魯西）的專利品，而施耐庵故事之集中在蘇北，比例還要更高，這種分割地盤式的情況不該沒有包涵什麼特別信息。

讓我們先看看有關梁山人物的傳說吧。

八十年代上半，水滸加工文學大量面世。這些「水外線」（從紅外線引伸而來）書籍，除了類別分明的改編和續作外，還有梁山人物傳說。此等傳說，有在地方性期刊出現的，有被輯爲專書的。前者如荷澤出版的牡丹雙月刊，發行量很小，銷路有限，即在大陸亦不易一見，在海外更難問津。幸而，輯刊出來的書籍，不少根據這些期刊，或來源相近的資料，性質應無大別，可爲代表⁹。

按數目來看，這些故事集中講兩類情節。數目最多的一類講梁山人物在上山以前如何正義凜然，鋤強扶弱，奮不顧身，遇到土豪惡霸、貪官污吏、奸商無賴，不是毫不留情地斬殺，便是用巧計弄到他們損失慘重。在數目上居其次者，講梁山諸人如何練就武功（一面練武，一面除害者也有，可按重點歸類，不必嚴格細分）。至於講梁山日常生活者，以及如傳統續書之講大聚義以後，或招安以後，甚至征方臘以後事情者，數目就少多了。奇怪的是，沿傳統說書的路線，擴充大聚義以前水滸已有之故事者，數目竟然最少。單從這點去看，就很難說這些故事是傳統口承文學的一部分。

故事集中在什麼情節，代表興趣的傾向，原不必深究。然而，這裏所表現的傾向太現代化了。事情非黑即白，人物非善即惡。在大陸評價文學和歷史，二元相對論向來是放諸四海而準的法門。五六十年代當然早有這一套，但走極端還是七十年代以後的事¹⁰。據此，這些美其名爲歷久相傳的故事就有一明顯的年代上限。

這上限還可說得清楚些。七十年代中期爲水滸的厄運期。在寡頭政治明

9 撰寫此文參考的傳說集計爲王太捷、朱希江編水滸梁山的傳說（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5年）；徐華龍編水滸英雄外傳（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王成君編水滸人物傳說（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華積慶編水滸英雄外傳（北京：寶文堂書店，1986年）；張振和、蔡如慶編水滸梁山民間故事（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7年）。

10 七十年代初中期，上自知識份子，下至工農兵階層，整個大陸盲從執政者的呼籲，儘數強分歷代人物爲正面的法家和反面的儒家，以求證明儒法之爭貫徹整個中國歷史，只謀達到政治目的，不理歪曲真相至何程度，可作爲極端二元相對論的好例子。

令之下，只有李逵、阮氏兄弟等數人有資格當永遠革命者，山寨的真正領導人物，除了早死的晁蓋，統統被罵得狗血噴頭，貶為十死不赦的惡毒反革命份子。把梁山人物儘數捧為光明磊落，大公無私，敢作敢為的典範的故事是沒有機會在這種環境下產生的。這些所謂民間傳說的出現，要等到四人幫下了臺，水滸本身恢復了聲譽，才有可能的。

說這些故事之過度現代化，並不是依據它們的黑白衛立場和極端描述，它們專講哪些人物，迴避哪些人物，也具備相當顯示性。

故事總數雖多，梁山一百零八人在此出現的不過三分之一。數目本身不是問題，誰會希望讀到誇耀宋清、白勝、孔亮之類酒囊飯袋的故事？成問題的倒是入選的標準。在水滸裏，梁山人物出場的次數和時間的長短，和他們對山寨組織的重要性成正比例。這是任何讀水滸者所共有的印象。如何僅挑二三十人來講，個別讀者或會包括若干自己特別愛好的冷門人物，大部分中選者，任何人去挑，都差不了太遠。可是，在這些給說成是來源廣泛，歷時久遠的故事裏，數目有限得很的入選人物却出現極不合邏輯的情形。李逵、武松、吳用、李全、魯智深、石秀、三阮、張順、公孫勝、劉唐、時遷、花榮、朱貴、燕青等要角經常這些故事中出现，理所當然。至於安道全、樂和、白勝、蕭讓、王安六、杜興輩之偶爾充當要角，目的顯然在試圖強調下層成員的重要性。這樣的安排固然與梁山集團在水滸書中之上下階層嚴分等級，不相協調有關¹¹，因而反映出其順應時代要求的現代化本質，說來還不够隨後說明的幾點來得顯露。

故事要講的人物，數目本已有限，故事又再集中在少數人身上，以致重要人物如林沖、史進、柴進、張清、呼延灼、戴宗，雖然入選了，却只有內容貧乏，胡亂拼湊，甚至毫無辨識特徵的故事三兩個。其他在水滸書中份量相當者如秦明、關勝、楊志、楊雄、董平、李應，連影子也沒有。這樣一來，大聚義排座次時的馬軍五虎將就缺席了三人，而在梁山坐第二把交椅的盧俊義僅在燕青的故事裏扮演過一次愚昧頑固，利慾薰心的配角。

如果把盧俊義的負面形象，和那個給弄得像個莫名其妙的小土霸的柴進，以及根本沒有出場機會的李應合起來看，就不難悟出道理來。梁山一百零

11 越是下層的梁山人物，上山前，入夥後，出場機會越少，出場時間越短，上山後卻越要擔承維持山寨日常運行，無時或息的基本工作。高高在上的領導人物，如果不是征戰，平常確是清閒得很。

八人，只有三個財主。盧俊義是員外，李應是莊主，柴進是貴胄（晁蓋雖然也是員外，但早死，沒有機會參加大聚義）。在梁山泊這個靠封建思想去維持體系的組織，排起名次來，三人都位崇權重（名次最低的李應也排名第十一，和排名第十的柴進共掌山寨錢糧）。對把水滸看成是一次轟轟烈烈的農民大起義的小說化紀錄的中共政權來說，這三個出身「不清白」者的高高在上真是尷尬。在「民間傳說」裏處理起來，只有能避就避，不能免時，便好話少說，壞話則不妨說些。所不能避免的，就是因此而給這些故事蓋上鮮明的現代性烙印。

楊志、關勝等雖然被遺忘得一乾二淨，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這在水滸裏基本上僅各得一兩次配角式出場機會的三女將却在這些故事內給大書特書。其中有些故事還把顧大嫂和孫二娘這兩個本能平平的夜叉式人物寫成嬌俏艷麗，人見人愛，兼且武藝高強（扈三娘是武功超羣的美人兒，這點不成問題）。在這個提倡男女平等的時代裏，無論大陸的婦運成績如何，表面工夫仍得照做。但水滸是一部男性中心的書，潘金蓮、潘巧雲的蕩婦形象且不說，梁山陣容就僅得三個點綴式的女將而已，連條件極佳的扈三娘在大聚義前也沒有一次開口說話的機會，還得背負在殺父滅族仇人蔭庇下獻出肉體，忍辱偷生的黑鍋。怎樣才能使這本書追得上時代，不無問題。結果採用的法子，就是把水滸所說的全拋諸腦後，儘量在體貌、武藝、膽識、智慧上給此三位女將胡吹一番。要說這些是歷久相傳的民間故事，豈非掩耳盜鈴！

三女將須要升級，宋江却有降級的必要。毛澤東死前總動員去清算宋江，罵得不留餘地，現在沒有人再附和是一回事，但紀錄全在，要推翻它又是另一回事。在大陸這種朝令夕改的社會，凡是有後遺病可能的話還是少說為宜，何必自種禍根？因此，宋江的故事在這些水滸傳說集子裏少之又少，有的乾脆一篇也不收。編集者這種現實得很的態度又是替這些故事的年代加一注腳。時間不必說得太早，只要這些故事寫成於一九七五年初秋毛澤東發動批判水滸以前，它們在數量上，在吹捧的程度，必定合乎宋江在梁山坐第一把交椅，在水滸書中佔篇幅最多，以及受中共推譽二十多年為標準農民起義領袖這些多重特別身份的。現在他却給冷落蔑棄到連顧大嫂、白勝之流還不如！這些所謂民間文學作品，究竟能有多久的歷史，不問而知。

與宋江關聯的還有一件見微思著之事。毛澤東晚年鞭撻宋江時，他特別強調晁蓋一死，宋江便立刻改聚義廳為忠義堂，把忠君之忠看得比兄弟義氣之義更重要，因而指斥這表露出宋江反革命的陰謀。這是一廂情願，不可理

喻的說法，一則晁蓋時期的聚義廳只是普通名詞，不是專稱，二則明版水滸絕大多數都標榜忠義二字作為書名的一部分，而明人評水滸更經常把注意力放在忠義的觀念上。無論今人喜惡如何，忠義的觀念和忠義堂名稱的使用與水滸的成長過程是不可分割的。歷史悠久的水滸傳說總該有不少用忠義堂的名稱才對。可是在這批為數不少的故事裏，忠義堂之名僅一見，其他場合，不管晁蓋是否已死，全用聚義廳。經毛澤東指出「忠義」的不妥後，明哲保身者當然可避則避。不然來源不同的民間傳說，僅經今人整理（而且還是好一大堆屬於不同單位的整理人），絕不可能過濾得如此乾淨的。

上面說過，打抱不平的黑白衛故事為數最多，其次就是講苦練武功的。專講練武也現代化得很，水滸並不注意這一套。梁山諸人如何練武，過程讓讀者看得到的，僅史進一人，講得也平實無華。對其他人物武功來源的交代，往往只是出身將門，身為職業軍人，當教練，任都頭，走慣江湖之類，不能確算是解釋的解釋。真正給描述得武藝超卓的，數目實在不多（林沖、楊志、秦明、董平、索超、武松、呼延灼、魯智深、扈三娘等屬於這一組）。別的即使重要如李逵、劉唐、朱仝、雷橫、李應、徐寧等等，其中不少還有個別武打情節的，水滸根本沒有把他們形容成武功上乘¹²。至於幫襯式的武將，有的僅靠奇門武器或戰術來標榜（如龔旺、丁得孫、韓滔、彭玘），有的書中還特別聲明他們技藝平庸（如陳達、楊春、周通、王英）。不以武藝見稱者，如杜興、宋萬、張青、樂和輩，更不必說了。

水滸處理武藝之事，務實求真，不重誇張。水滸成書以前的雜劇和宣和遺事也沒有在武藝上花精神。現在這些傳說却大大不同。梁山人物凡有機會露面的個個武藝精湛，身手不凡。專講練武過程的故事更是說得天花亂墜，什麼異人秘傳、萬里求師、妙法苦練、無師自通、奇門武器、超人功力，現代武俠小說的法寶，應有盡有，悉數落齊。談起武術，猴拳、八卦拳、八級神拳、螳螂拳、鐵沙掌之類，信口雌黃。講到招式，猛虎掏心、銀龍探月、老君封門、白猿登枝、鐵僧拜佛之屬，隨意添插。內容與手法完全違反文學發展的紀錄和規律。

與此相應的，就是大減水滸中非凡本領與宗教的連繫。職是之故，公孫

12 見馬幼垣「李逵的武功」，中國時報，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人間」），及馬幼垣「水滸傳與中國武俠小說的傳統」，收入劉紹銘、陳永明編武俠小說論卷（香港：明河社，1990年），頁二〇四—二三〇。

勝苦練的是紮紮實實，如假包換的武功，不是道家法寶，而戴宗之所以健步如飛（不是日行八百里），是因為他歷年四出訪師，路走多了，因而「神行」，與道家扯不上半點關係。這種矯揉造作，削足適履的寫法正好反映大陸政策對宗教不友善的實況。

既然如此，期望這些故事與水滸相配是萬無可能之事。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孫二娘練成順風耳和千里眼；戴宗善長三節鋼鞭；白勝會飛簷走壁；菜園子張青的武功幾乎和武松一樣好。胡說八道，比比皆是。

大陸嚴禁武俠小說三十餘年，向港臺作品學習是最近幾年才慢慢由暗至明之事。這些武俠小說化的故事的寫作年代，不待辨明。

上述種種自然影響到可讀性。這些故事大率情節重複，人與事之間缺乏關聯，往往只需改易人名，故事即可隨意對換。

想突破的，就走捷徑，企圖用添油加醋，甚至瞞天過海的技倆去輕易達到目的。於是乎：宋江為解旱黑龍的化身，因此叫做及時雨；宋江有妻名鳳凰女，善使大刀，原在江州附近據山為王，李逵把他們撮合起來；魯智深三月初八生，屬馬；魯達原娶妻趙氏。岳父為江湖賣藝人，教二人武功，暗留一手給女兒，魯怒而外出訪師學藝三年。待返家，妻已病重，僅怨魯太逞強便死去。魯痛悔之餘，出家為僧，易名魯智深；魯智深帶同文武雙全的嫂嫂張氏，沿途保護充軍的林沖。赤松林之役後，張氏隨林沖去滄州，還留下來照料他的起居。及至火燒草料場，林沖夫婦大戰陸謙帶來的百餘人，張氏右手給斬斷，但仍終用套狗繩把陸之頭切下來。夫婦二人殺出重圍後，直奔梁山入夥。一百零八人的名單沒有張氏，因為她失了右手，僅能在幕後獻計；武松打虎以前，先跟癩拐李苦練了一年「醉八仙」功夫；武松征方臘斷臂後，開裁縫鋪為生；武松、魯智深先後出身少林寺；未發跡以前的高俅曾和潘金蓮打過官司，為智勇雙全的潘金蓮所敗；潘金蓮和武大郎是患難夫妻，互敬互愛；武大郎身高丈餘，腰圍逾三尺，相貌堂堂，聰明過人，讀書過目不忘；呼延灼的雙鞭，一根是鎮山老人（什麼山却不說）千年前奉玉皇大帝旨意盜走過路的二郎真君的神鞭，另一根則變自老人手執的八節竹手杖，因此左右兩根重量有別；劉唐之父三十七歲才娶得年輕寡婦，遂生劉唐；劉唐的全身赤毛是染的，也僅染過一次，隔日便洗去；王定六為安道全徒弟，上山前，師徒借周遊行醫去劫富濟貧；李逵十七八歲時在鄉里殺人後，直奔梁山；顧大嫂、孫二娘、扈三娘在沂蒙山隨白雲聖母習藝十餘年，顧為逃出來的童養媳，孫為給人遺棄路旁的小閨女，扈則為救自虎口的女孩，按年紀排次

爲大、二、三；朱貴、朱富兄弟爲烹調名師；朱貴鬥妖道，跟吃了大力丸的「何仙姑」苦拼三夜；阮氏三兄弟一胎同生，父四十出頭始結婚，母比父大五歲，母短命早死；阮家兄弟所以稱小二、小五、小七，因爲老父隆冬患病，命他們破冰釣鮎魚去調治，三子回來，分別得二斤、五斤、七斤魚各一尾，因以爲名；時遷本名李遷，發明曹州名菜鳳凰宿窩（冬瓜填雞）；時遷遠赴交趾國淨水湖盜雞頭米（芡實），回來在梁山泊種植¹³。諸如此類，幼稚無聊，畫蛇添足至難以令人容忍的程度。

以上所舉，或嫌簡略，不妨提要兩篇有連貫性的扈三娘故事來說明這些傑作究竟胡鬧至何程度。其中一篇說：

遼將阿里奇犯中原，強奪腹大便便的漢人美婦而歸（先殺其夫）。婦爲扈太公妹。三月後，婦生一女，交漢人奶娘照料，告以真相，即自盡。阿里奇早有二女，故稱此女爲三娘。三娘既長，阿里奇待之甚薄，命其牧羊，而奶娘終告三娘真相，三娘便在牧羊時，無師自通，練成繩索絕技。其後阿里奇讓三娘學使雙刀，技益進。三娘終斬殺阿里奇，逕返中原，投靠扈太公。

這樣的故事固然離譜，至少和前段所引大多數的例子一樣，講的僅是當事人在水滸書中未露面以前之事，蛇足難免，但仍未算真的與水滸的內容有嚴重衝突。下面的一個故事却截然不同：

扈太公爲扈三娘安排比武招親。王英與呂方獲得晁蓋的准許，下山應招。因扈三娘三年前殺了遼將後歸宋，遼國恨之入骨，遂派完顏毒託名祝朝奉，帶同三個易名爲祝龍、祝虎、祝彪的兒子，混入中原，在扈家莊附近築起莊園。既逢招親，祝家兄弟準備其中一人賺得三娘後，便在洞房時斬其首級，回遼邀功。豈料比武時，祝龍給三娘斬去一耳，祝虎又被她削去鼻子，而王英的品格高逸則令三娘肅然起敬。待酒色之徒祝彪和三娘交手，他卑鄙到暗放袖箭，幸好王英眼明手快，用銀鏢擊落。其後祝氣兄弟施夜襲，碰上不帶兵器散步的三娘，幾遭毒手，又幸遇王英，一下子就用飛鏢把他們三個都打傷。三娘在感激佩服之餘，遂隨王英、呂方上梁山。這就引出宋江三打祝家莊。

水滸和這類故事之間，相同的不過幾個人名而已，其他全部給顛倒乾坤。負責這些故事者的荒謬絕倫，極胡鬧之能事，任何人均無法代辯。爲何大陸當局不單容忍此等勾當，還廣事發行？這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

答案並不難找。好一羣武林高手，每遇不平，個個怒目橫眉，咬牙切齒

13 這些「民間傳說」悉見注9所引各集，既全屬荒誕不經之物，沒有理由浪費筆墨去逐一交代出處。

，活像大陸革命樣板戲的主角一樣，先除民害然後快，而地方上具權勢財勢者又非是壞蛋不可，豈不是階級鬥爭的最佳例證？無聊文人看到此登龍捷徑（起碼是謀生之道），於是競相「搜集」、「整理」，很快就滿足了執政者的要求。

這些掛名民間傳說的內容，如何胡鬧不經尚不是它們最大毛病之所在，最嚴重的錯失還是在它們設法迴避許多與水滸不可分割的話題。

梁山聚義，環境使然，前無計劃，後無步驟，個人行動與集體行動全是因應性的，見一步，走一步，哪裏稱得上是義軍？哪裏是搞革命？水滸敘事，也不明善惡之別，行動往往決定於一己之需要或己方的利益。前者可用林沖為例。林沖明知不該因自己的生存去殺害無辜，爲了要王倫收容他，還是挺刀去斬殺毫無瓜葛的過路人楊志。林沖爲人正直，尚且先己後人，等而下者如燕順、王英之流，過境陌路人不過配作醒酒湯的材料而已。後者可以用宋江的行動爲代表。爲了逼使秦明入夥，宋江不惜設計害得秦明全家被殺，附近村莊給焚毀。試圖辯說目的可以是正手段的亦不能否認這是很極端的行動。

何況上舉兩事並不算例外，水滸中多的是開黑店（張青、孫二娘）、打家劫舍（所有小山寨均賴以維持）、詐取犯人財物（戴宗、施恩）、魚肉鄉民（穆弘、穆春）、劫殺行旅（李俊、童氏兄弟）、包賭包娼（施恩）、好色劫色（王英、周通）、出賣同門（孫立）、凌辱弱小（李逵覺得歌女妨礙他們談話，毫不警告，重重兩根指頭就向女的額上點過去，當場把歌女打昏）、乘人之危（閻婆借靠宋江生活，宋則寫好同居文件要她簽約，文件由宋收存）、吝嗇小器（李忠、周通）、不忠職守（董平、關勝、韓滔等武將一旦爲梁山擄獲，立刻投降，調轉鎗頭），每一件均足令這些「民間」故事的主角怒髮沖冠，不殺不快，說來豈非欠解之極？難道是水滸中的梁山人物比傳說中的梁山人物大大退步了？

這些「民間」故事的作者根本不明白水滸的主旨在闡明人性，特別是只知有己不知有別的人性弱點。梁山諸人的行徑，值得褒揚，足爲典範的，水滸固然講得清楚，自私自利，蠻橫奪理的亦坦然直書。這種善惡並陳的寫法同樣用在非梁山人物的身上。官府中人，以及在地方上有權有勢者，水滸就很明確地說，不少是善良的、正義的，例如：維護魯智深的趙員外，愛屋及烏，誠厚感人；處理宋江、林沖、武松案件的幾個地方官，明理體恤，在有限的權力範圍內做到公私兩全；朱全充軍滄州，收容他的知府絕對稱得上

仁厚爽直（梁山集團却教朱全以怨報德）；孟州衙門的葉孔目和康節級皆光明磊落，正直仗義，給落難的武松不少幫忙和保護。就事論事，直述不諱的公平態度正是水滸可貴之處。那像這些所謂民間傳說的一竹竿打盡一船人，凡當官職的，凡有財勢的，必然惡毒滔天，永無例外。至於孫二娘輩之惡行，若非絕口不提，便辯說是傳聞失實（這等於相信水滸中人多是如假包換的歷史人物）。如此是非顛倒是犯了嚴重左派幼稚病的結果。在這些作者的世界裏，只容許有黑白二色，但他們連辨認何者為黑，何者為白的本領也沒有，遂致爭相炮製出一大堆令人嘔心的假古董來。

這些故事與水滸之不協調，以上所講固已很嚴重，在程度上還遠不及它們漠視晁蓋、宋江間的矛盾，以致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完全無法掌握水滸的要旨。

水滸的片段性結構需要一條脈絡來聯繫前後情節，來表達其剖析人性的宗旨。在大聚義以前，這條貫徹性的脈絡就是架空晁蓋。通過這脈絡去看，晁宋二人之由恩轉怨，推私及公，終至互不相容，陰謀詭算，種種變化以及梁山命運如何受其影響，均層次分明，誠然為瞭解水滸實質的關鍵¹⁴。這批故事絕口不談這些，講到晁宋兩人，總說是難兄難弟，親密戰友，有始有終的革命好伙伴。

也樣去處理他們的關係，依據傳統，誇張梁山領袖階層的團結和革命精神，以及不明白水滸的本質，兼而有之。此外，還得加上一個很現實的因素。

架空晁蓋的觀察是毛澤東首先提出來的。儘管他搞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把戲，借古喻今去清除異己，僅講對自己形勢有利的話，大大歪曲真相，晁宋間的勾心鬥角嚴重地削弱梁山組織的團結，和擾亂領導階層的視線，致使他們做出不少蠢事（如浪費大量精力去誘逼可有可無的盧俊義上山），還是不爭的事實。本來按上面所說，這些「民間」故事大率產生在四人幫下臺之後，那時講架空晁蓋的文章早已億萬字計（雖然都是重重複複的），但在「後四人幫時代」，任何與毛澤東有關之事，還是少沾染為宜。漠視梁山高層的內鬥和矛盾，道理和儘量少提宋江是完全一樣的。

既然這些該說者不說，不該說者又絮絮不休的故事只是近年製造出來的

14 見馬幼垣「架空晁蓋」，聯合報，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九月二、四、五日（「聯合副刊」）。

假古董，那麼真的水滸傳說該是怎樣子的？

金聖嘆腰斬本水滸面世以後，那些暢銷一時，包括招安及以後情節的各種本子，在中土旋即泰半絕迹，現在所見的孤本多是十七世紀流落異域，幸得保存之物。發行數目相當多的正式出版物尚且如此，原來的水滸傳說，缺文字依賴，在水滸成書以後很快便煙飛灰滅，該可斷言。招安以後的情節，全是狗尾續貂。遼國、田虎、王慶三部分固不消提，連征方臘之部，偶得今人好評¹⁵，也是如此。它們續寫起來，公式化得很，不是遇敵殺敵，殺得斬瓜切菜，便是收了一批又一批莫名其妙的降將去充下次戰役的犧牲品，要不然就是反過來，在方臘部分讓那些面目模糊，無法記憶的傢伙把推重已久的梁山人物斬殺得如切豆腐。招安以後的幾十回書（實際數目按版本而定），就是這樣重複地折騰下去。

所以如此，除了續作者的低能外，還有一關鍵性的因素。水滸的成書，基於兩三百年水滸傳統的因承。民間資料的運用是選擇性的，是融會性的，成書後的水滸對這些傳說反成了威脅，減弱它們繼續流傳的機會。招安以後情節的續寫墜入機械化的形式框框，多少總與作者們之不能利用民間傳說有關。最遲到了萬曆中年，這些傳說故事已日益稀少，這說法應可成立。

雖然如此，這些傳說的內容還是可略窺端倪。

水滸成書前的水滸故事，以見於宣和遺事者為最完整。其間所述，與水滸固然有不少細節上的不同，性質和故事主線則沒有太大分別。宣和遺事一書內容蕪雜，水滸部分的來歷雖不可考，其源出民間當無問題。水滸成書所賴的民間故事不應和宣和遺事所講的出現南轅北轍，互不相干的情形。現在那一大批希望大家信以為歷久相傳的故事與宣和遺事的關係正是方枘圓鑿，格格不入。

這些故事與水滸成書以前的雜劇同樣談不上任何關聯。

早期雜劇與宣和遺事有一顯著的共通點：所講梁山人物數目很有限，真正有故事可述者更少。這些人物不外乎宋江、李逵、魯智深、武松、楊志、晁蓋、燕青、董平、呼延灼等。水滸傳說與雜劇及宣和遺事年代雖難盡同，性質及對水滸成書的影響則該無大異，所講的人物也就僅可能限於一個相當少的數目。在連林沖、吳用、三阮、戴宗等在水滸書中扮演重要角色者都不

15 如張淑香「從驚天動地到寂天寞地：水滸全傳結局之詮釋」，中外文學，一二卷一期（一九八四年四月），頁一三八——一五七。

可能在早期傳說中有獨當一面的機會之情況下，把楊春、金大堅、白勝、孫二娘之類極可能到了水滸最後成書才製造出來滿足數字需求的幫襯人物說成是早就有不少獨立故事的要角，是不合邏輯，違反文學發展常規的事¹⁶。

從另一角度去看，水滸傳統大有可能起源於南北宋之際華北義軍的抗金活動¹⁷，而與所謂宋江梁山聚義關係極微。見於這段時期文獻的忠義軍人物，名字與梁山諸人相同或近似的多達二十餘人，梁山集團以外的水滸人物復有數人是這樣子的。其他小說並沒有類似的情形（歷史小說講歷史人物，那是另一回事），所以不能用偶合去解釋。但忠義軍人物的經歷與梁山諸人的事蹟，鮮有雷同之處，要找尋演變的橋樑，民間傳說應是合理的答案。

這樣說來，我們縱使看不到真正的水滸傳說，認識還是有的，而且還足夠作為辨偽的準則。用這些準則去衡量那批集體出現的新資料，真相立現。那些作者既不明白水滸的本質，更沒有水滸傳統演變過程的知識。

如果說這批「民間傳說」為不折不扣的冒充貨，近年環繞着施耐庵的一套則是轉真為假的糊塗賬。

最晚到了嘉靖後期施耐庵之名已成為水滸傳統的一部分。但除了在本子上填報「施耐庵集撰」字樣外，對於施耐庵本人的認識始終是一片空白。這長久的空白容許遲至三四十年代才出現墓誌銘、小史之類的文獻，以及施耐庵為蘇北興化（已改名大豐）施族祖先的說法。這些資料五十年來雖曾有人用求證其為真確的態度去調查過，在水滸研究領域裏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應。

孰料1981—82年間有關興化施彥端（父）、施讓（子）、施廷佐（曾孫）幾代的文物紛紛出現，族譜、地券、殘碑、墓誌銘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早幾年出土），而族譜上附筆旁注彥端「字耐庵」，於是一切都給連串起來，加上施耐庵種種傳說、遺作之類隨着爭相出籠，好事者遂真假混集，一爐共治¹⁸。他們努力的結果可以分兩段提要如下：

施彥端，字耐庵，原籍蘇州閶門外施家巷，為孔子七十二弟子施之常後人。父名元

16 有關的討論，見注1所引拙文。

17 見孫述宇水滸的來歷心態與藝術（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年），頁四七——一四〇；王利器「水滸與忠義軍」，收入氏著耐雪堂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頁二一九——二三四。

18 有關背景，可參閱張國光「一九八二年的施耐庵熱從何而來？」，江漢論壇，一九八三年三期（一九八三年三月），頁四一——四五。

德，爲舟人。母姓卞氏。弟彥明、彥才二人。元配季氏，續娶申氏，生子讓，字以謙。彥端晚年率家遷興化，今傳至二十六世孫。

施耐庵生於元元貞二年（一二九六），十三歲入私塾，十九歲中秀才，二十九或三十歲中舉，三十五歲與劉基同榜中進士，成莫逆之交。中舉前（泰定年間，二十多歲），任鄆城訓導，廣集梁山傳說。三十五歲至四十歲之間官錢塘二載，秉公斷案，教民種花生、茨菰、荸薺，後與當道不合，復返蘇州。與張士誠部將卞元亨善（或云爲表兄弟）。至正十六年（一三五六），張士誠於稱滅王後兩年定都蘇州，時施六十歲，不應張之聘（或謂曾入士誠幕，諫阻其降元不納而辭去）。後流寓江陰，曾在祝塘徐麒家坐館。七十一或七十二歲，避戰亂，遷興化，定居白駒鎮施家橋。朱元璋興起，禮聘再三，終不應。旋水滸書成，朱元璋斥爲倡亂之書，逮入天牢，幸獲劉基保釋，始免於難。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卒於淮安，享壽七十五歲。

首段是從文物中得知施彥端的基本大綱，除了字耐庵一點外，並無問題（孔門之後，顯屬攀附，可以不理）。

次段是利用這大綱去串連各種施耐庵傳說和雜聞，在件件合用，任何矛盾均可以解釋過去的立場下炒成一碟的李公雜碎¹⁹。二十世紀以前全無所聞的施耐庵三兩個回合就主要資料、基本數字，樣樣俱備。歷代多少名人都沒有這樣齊全的檔案。這不是刻意配製出來的神話是甚麼？信者却大不乏人。

環繞着這套神話的還有一塊任君發揮，用之不竭的園地。在民間承傳或得自施家後人的保護色下，各種見怪不怪的故事遂應運而生：施幼家貧好學，過目成誦，喜讀宣和遺事等平話；精通技擊，經常打抱不平，結識不少江湖好像；施設館蘇州時，太原商人携次子羅貫中至，成爲施之得意門生，羅後隨施遊歷；爲了免張士誠眷戀女色，施和卞元亨用迷魂香薰倒張的愛妃香香和珍珍，把她們送回民間；施最恨姓潘的女人，因爲張士誠的妻舅潘元紹慫恿張向朱元璋投降；施教人種童子糶，解救了朱元璋部隊的馬瘟病，劉基知有能人在，訪得爲已死之師兄，遂往憑弔，見墳在龍脈上，異而掘之，始知師兄故佈疑陣，隱居別處；施善堪輿，常替人看地理；施家貧，遂送女水滸書稿以爲嫁妝，後女急款用，求書坊出版，惡商副錄後退稿，施知之，卽對女說，不妨事，稿僅講三十六天罡，不算完整，遂增七十二地煞，乃成現

19 上述兩段施耐庵事蹟提要，根據以下諸書的結論綜合而成（出處無需逐一注明）：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施耐庵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曹晉傑、朱步樓施耐庵新證（上海：學林出版社，1986年）；張惠仁水滸與施耐庵研究（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1988年）。

今之水滸²⁰。

如此荒唐語，竟能廣事傳播，除了擾亂視聽，愚己愚人，浪費出版物資外，還有什麼話好說。

評價施耐庵種種，最重要應認識到，有關興化施家數代的文物都是真的，但却與施耐庵毫無關係。以施家諸人之平凡，如果不是和施耐庵拉在一起，這類文物在中國大陸恒河沙數。奈何一旦把施彥端說成是施耐庵，就演出這場援真證假，假又充真的活劇。其實所有文物沒有提供任何一點實證能把施彥端和施耐庵相等起來²¹。把他們撮合者，只知在外圍兜圈子，自圓其說，水滸的內證，水滸成書的過程，一概不管。簡單地說，水滸既不可能成書於元末明初，也無可能是一人一時之作。治水滸版本和研究水滸演變原委的很少相信施耐庵隻手單拳著書這一套，不是沒有道理的。

把向來一無所知的施耐庵和歷史小人物施彥端畫上等號，熱鬧起來等於給攀附依託者、捕風捉影者開張空白支票，讓他們肆無忌憚地打着民間傳說的幌子去炮製出一大堆無聊透頂，讀之令人啼笑皆非的東西來。

還有一點，水滸一書以冀東魯西為主要地理背景，魯西以南就是蘇北。如果蘇北人作水滸，為何流行山東的梁山人物傳說和盛傳蘇北的施耐庵故事竟是井水河水不相交通呢？這種我行我素的情形最少可以表示這兩批各在鄰近流通的故事都嶄新得很，還沒有時間讓它們融會溝通。

道破了這些勾當的真相，還得解答一附帶的問題。這樣大規模的說謊做假怎能公開進行呢？解釋可從好幾方面去看。

在大陸上治通俗文學有一奇怪的觀念，以為越多越好，越熱鬧越妙。寫作題目重重複複，爭論纏繞不清，甚至容許一稿兩投，登過的稿件開會時照樣亮相，都反映大陸文化界只管眼前，專求數量的怪現象。活動因此是一窩蜂的，風尚一過就顯得異常冷落。梁山人物故事短期內推出一大堆，基本題材只有幾個，正是這原因（施耐庵故事數量少多了，反而顯得沒有那麼重複

20 這些不必逐一注明出處的所謂傳說，除散見注19所引各書外，主要根據馬春陽編施耐庵的傳說（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以及注9所引徐華龍和華積慶編之兩種水滸英雄外傳中的施耐庵部分。

21 否定興化施家文物與施耐庵有關的學術報告，最詳盡者當推劉世德「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中國社會科學，一九八二年六期（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頁一七一——一九九。此文發表以後，贊成施耐庵著水滸者自然有反駁之作，其實盡是連研究法和邏輯都無法掌握的強辯之詞。

）。五六年前，大陸各地一口氣出了幾十本歇後語詞典，正代表這種情形。施耐庵和梁山人物傳說裏隨處都是歇後語，亦步亦趨得離譜，這點也可用來補充證明上面所講這些故事的真正寫作時期。

惟恐後人地爭相出版，背後便是一下子就會趨飽和，最熱鬧的題目轉眼便乏人問津。交上一九八七年，有關施耐庵生平和傳說以及梁山人物故事的刊佈就數目大減（實際的討論結束得還要早些）。這情形在大陸既非尋常，人們早養成敏銳的感覺，一有應時題目出現，立刻集體響應，打鐵趁熱，盡量把握短暫的機會。

四人幫垮臺後，大陸上又重新聲明水滸讚揚農民起義的正面意義。梁山人物故事之與這一套表裏相應，上面已說明。強調施耐庵的著作權，性質亦相同。如果說水滸在兩三百年的多元性發展上增刪融會，始成雛型，而成書後復經過徹底的改寫，才是我們今日看到的本子，總不比說水滸是一人一時之後，今本就是成書時的原貌，又有個具名具姓的作者去增加觸覺感之易於強調其革命意義，和容易叫普羅大眾明白。熱烈討論施耐庵生平那一兩年間，無論贊成者是如何強詞奪理，無論他們的辨證法是如何無稽，他們在人數上，在出版數目上，始終佔上風。在政治要求重於一切的社會裏，現實就是此如。²²

22 這種無聊文人趕搭公車的現象不限於水滸。五十年代以來的紅學就免不了這種污染。如找些老人來問問曹雪芹逸事和曹家掌故，然後配合史料，大做文章。不少堂堂正正的紅學家尚來這一套，下焉者更不知所止。以紅學的聲勢，這種行徑之產生火車頭作面毫不足奇。那些掛名水滸（以及施耐庵）傳說已够烏煙瘴氣，影響所及，更每况愈下。近見劉巽達、馮沛齡編的金瓶梅外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簡直是橫衝直撞的脫軌火車，還借用最新學術成果，胡湊一頓，來壓陣腳，對讀者的智慧作最大的侮辱。金瓶梅研究是近年的顯學，雖然聚訟難免，前所未聞的發現實在不少，其中謝肇淛（1567—1634）、劉承禧、丘志充等人對金瓶梅成書及其早期傳播之深具關係是舍弟泰來公佈新得的謝肇淛「金瓶梅跋」後，大家始知之事。現在此兩特具顛倒乾坤本領的編者卻硬說這數人與金瓶梅的關係在民間傳說中早有詳細說明，一經搜集整理，便紀錄完備。但是他們混冥道來者，講的不論是書中角色，還是與成書過程有關的人物，全部生吞活剝，令人噴飯。這班無聊份子的信口雌黃，單看他們介紹丘志充的話就够了一一「丘志充這人當過太監，是劉承禧的一個遠房親戚」。太監是年少閹割後的終生職，怎樣「當過」？妖言惑眾者原來連文史常識也沒有！其實丘志充走的是一般性的科舉仕途，萬曆四十一年（1613）成進士，崇禎間官至布政，其子石常（那些荒謬之輩難道要我們相信太監生子）且有詩文集傳世。這種無中生有的所謂民間傳說集爲了虛張聲勢，每於篇後列出流傳地區、何人口述（有時還記講述人年歲，以示傳說之古舊）、

近年在中國大陸流行的水滸傳說是應一個歪異社會的畸形要求之產品，絕對不是民間文學。

何人搜集整理等等，煞有介事，企圖證實來源可靠，方法正確。在這方面，這本金瓶梅外傳不單非例外，其中所列的整理人還有不少正是搜集施耐庵傳說者，難怪其胡說八道如出一轍！因為此集給西門慶、潘金蓮、武大郎等水滸人物不少篇幅，性質又與正文所說的假古董沒有兩樣，故在此多講幾句，以說明這種勾當危害之烈。究心民間傳說者若疏於辨識，引用此等贗品，必導致錯誤百出的結論。大陸當局如不肯及早遏止這些不法之徒蓄意破壞文化之舉，日後的惡果是不易收拾的。